

高阳历史小说系列②

# 粉墨春秋

中

春梦无痕



高阳  
著

高阳历史小说系列

# 粉墨春秋

第二部

春梦无痕

# 目 录

## 第二部

1 . 回风小舞	1
2 . 悔不当初	9
3 . 亦敌亦友	36
4 . 满洲真相	45
5 . 正气犹存	66
6 . 客中惊艳	97
7 . 扶倾济危	117
8 . 春梦无痕	130
9 . 新知话旧	156
10 . 美机东来	197
11 . 大海冤魂	212
12 . 力争上游	227
13 . 危机暗伏	246
14 . 另开新局	265
15 . 侠林恩怨	279

# 1 回风小舞

## 司徒雷登愿作调人。

其时为日本新闻界称之为“和平运动参谋总长”的周佛海，对“组府”正起劲之时，在上海招兵买马，许下了好些“部长”、“次长”，而且连“新政府”的预算都编好了。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，以致于哪一天才能粉墨登场，却是个未知数。

一个问题是青天白日旗上的飘带。汪精卫坚持要取消，而日本军部特地召集华中、华南、华北 3 个派遣军的参谋长，在

东京开会研究，一致表示：青天白日旗上挂飘带，作为“汪政府”的“国旗”，已是最大的让步；如果连这条飘带也要取消，变成敌我不分，不但在实际作战上有妨碍，最严重的是会影军心，万一发生哗变情事，勿谓言之不预。

提出这样的警告，日本军部自然坚持原议；汪精卫也知道事实上有困难，只能拖着再说。

再有一个问题是今井从香港回日本以后才发生的。原来关于“汪政府”的国际地位问题，周佛海曾经与日本外务省的代表加藤谈过，“汪政府”自称为“还都”，并非成立“新政权”，所以无所谓“承认”问题。周佛海只要求日本派遣“大使”向汪精卫呈递“国书”。

加藤的答复是，日本派特使不派大使，不递国书。周佛海表示，倘或如此，组成“新中央政府”毫无意义。谈得一场无结果而散。

当然，让步的必是骑虎难下的一方，周佛海跟汪精卫商量，用与日本当局同时发表宣言的方式，作为日本对汪精卫“组府”支持的表示。这个方式是影佐祯昭所同意，而且认为很合理的；但到东京去了一趟，他的态度改变了。

“贵方发表宣言，日本方面不便阻止；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，不表同意，亦不否认，采取默认态度。”影佐接下来将与今井商量好的解释说了出来：“因为公然承认，则日本右派及帝国主义者，必然反对，不能不事先顾虑。”

周佛海愕然，“汪先生的宣言，日本固不否认；可是，”他问：“日本的议员或者记者提出询问；日本政府如果稍为表示：这是中国片面的希望。哪一来，汪先生宣言的效力，岂不是

完全打销了？”谈来谈去谈不拢，只好约定第二天一起去见了汪精卫再作道理。

到得第二天一早，影佐忽又不速而至；一见面便问：“汪先生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，是否熟悉？”

司徒雷登是美国人，他的父亲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；所以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。周佛海认识此人，并不相熟；如今听影佐这一问，料知有话，考虑了一会，还是据实相答。

“他到上海来了；要由香港转重庆。我昨天跟他见面。”影佐紧接着说：“他对全面和平倒也很热心。”

一提到这一点，周佛海心情有些矛盾，全面和平固然是内心的希望；但一谈到全面和平，对于“组府”便横生好些障碍；日本军部不肯发表宣言响应，亦就是为了留下跟国民政府的和谈之路。如今横刺里又杀出来一个司徒雷登，眼前的情势，恐怕要弄得很复杂了。

心里是这么想，表面上当然表现得颇为兴奋的样子，“喔，”他问：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，他在北平跟王克敏谈过，希望王克敏出任蒋委员长及汪先生中间的调人。”

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！周佛海心想，司徒雷登在华多年，何以政治行情，一无所知？王克敏具何资格，能任此调人？

“不过，我们从另一方面接到的电报，与此不同。”

“所谓另一方面，是哪一方面？”

“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。”影佐停了一下说：“据说，司徒雷登本人想出任重庆与东京间的调人，托王克敏向冈村大将，探询意向。”

这两种情况，大不相同；王克敏虽没有资格担任重庆与东京的调人，但司徒雷登有美国的背景，甚至可能是华府白宫或国务院的授意，担任重庆与东京的调人，不但够资格，而且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。

“那么，”周佛海问：“冈村大将作何表示。”

“冈村大将觉得这件事不应该由他答复，所以打了电报给西尾大将，请求指示。”

西尾就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；周佛海心想，此事即使是西尾，亦未便贸然作决定性的答复，便即问说：“西尾大将当然要跟东京联络？”

“是的。一方面跟东京联络；一方面要我来联络，西尾大将想知道汪先生跟周先生的意向。”

听得这话，周佛海大感兴奋；因为西尾寿造没有撇开汪精卫，证明日本军人还是讲交情的。否则，重庆与东京，通过司徒雷登直接联络，汪精卫成了局外人，不仅没有发言的余地，而且连内幕都无从获知，那时的地位，岂不尴尬？

“周先生，”影佐最后才道明真正来意：“司徒雷登提出要求，希望通过我们的关系，请你跟他见一次面；谈谈汪先生跟你对全面和平的意见。”

这一下，周佛海不由得踌躇了。原来他的根本目的是：“组府”第一；谈和其次。以为有了“政权”在手里，就是有了一笔政治资本。但“组府”之事，从“高陶事件”以后，各方的空气不佳；全亏得周佛海在那里极力拉拢。如果传出消息去，说他与司徒雷登有所接触，大家都会想到：必与中日谈和有关；既然要停战谈和了，“汪政府”当然不会再出现。

见机而作，避得远些；否则“新贵”做不成，落个准备“落水”做汉奸的名声，太犯不着。这一来，不就等于垓下的楚歌，一夕之间，楚军瓦解！其事不可不慎。

但是，尽管影佐一直是支持他的；却由于他也一直跟影佐表示，只要有全面和平的机会，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。如今机会来了，倒说退缩不前，岂非言不由衷，平白让人把他看得矮了半截？

因此，他决定采取拖延策略，“要见面，就要谈得很具体；不然不如不见。”他说：“容我先跟汪先生谈了，再给你答复。”

事实上他没有去见汪精卫；而是跟他的智囊之一，岑春煊的儿子岑德广去商量。岑德广毫不迟疑地说：“这机会当然不容错过。不管谈些什么，你总要跟他会一面。”

周佛海想了一下说：“问题是，我去看他，他来看我，都不方便。消息一泄漏出去，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。”

岑德广当然了解他的言外之意，“那也容易！”他说：“你跟中间人约定时间、地点，到时候我派车去接，在我这里见面。即或消息泄漏，只说不期而遇就是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！人生何处不相逢？”周佛海认为这样做不露痕迹，同意照办。

“公博，快回来了吧？”岑德广又问。

陈公博早又回香港了，他对“组府”本不感兴趣，从高陶事件以后，态度益发消极，此时岑德广问到，周佛海叹口气说：“汪夫人预备亲自去劝驾，来不来未可知！”

“有公博在这里就好了；你跟公博一起跟司徒雷登见面，可以表示和平的愿望是一致的；以后报告汪先生，有公博在

场也比较好说话。”岑德广接着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先要跟汪先生谈一谈？”

“你看呢？”

“我觉得事后告诉他比较好。”

周佛海考虑了一下，点点头说：“有什么事，只有我先挺下来再说。”

\*

见面的日子，定在2月12日；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岑德广派了一辆车，将司徒雷登及他的秘书傅泾波，接到了愚园路岐山村的住宅，周佛海已经等在那里了。

经过短短的一番寒暄，司徒雷登用一口可以乱真的杭州话说道：“我等于一个中国人。”

就这一句开场白，周佛海与岑德广对这个高大的美国朋友，立即有了一种很微妙的亲切感，不约而同地深深点头，表示领会到他的立场。

“蒋委员长励精图治，这几年来国内无论物质上的建设，精神上的培养都令人刮目相看。不幸地爆发了七七事变，基本上也就是日本看到中国的进步，内心不安之故。”

周佛海接口说道：“我要说明，日本看到中国进步，内心不安，诚然有之；不过那是日本军阀的心境，而且也只是一部分日本军阀，像松井石根、杉山元之流。”

“是的！因此，中日之间的和平，在日本方面出现了机会；现在是中国方面的问题。将近两年的作战中，已证明了中国的军事力量，尚不足与日本相敌。如果此时求得合理的和平，

给英明的蒋委员长几年生聚教训的时间，仍旧可以跟日本一决雌雄。”司徒雷登紧接着以郑重的神色说道：“这完全是我把我当作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。”

“我完全能够理解。”周佛海说：“事实上，我们内心中也是这样想法。”

“你所说的‘我们’，想必包括汪先生在内。对于汪先生倡导和平，我极表赞成；不过传闻汪先生将另组‘政权’，如果所传是实，那是中国的另一大不幸。”

“喔，”周佛海以极沉着的态度说道：“请司徒博士作个简单分析。”

“很显然地，在对外作战时，内部和战的步骤，不能一致，已是一个弱点；如果造成分裂，更非国家之福。”

“司徒博士的看法，就一般而言，是不错的。不过，一时分裂的现象，也许反可以发生加速复合的力量。”

“分裂之后再复合，裂痕总归存在的。”司徒雷登不愿在这个问题引起争执，话锋很快地一转，“我这次到重庆，会谒见蒋委员长；很愿意将汪先生方面的真意转达蒋先生，谋求一个共济之道。今天想跟周先生见面，就是为了想了解汪先生方面的意见。”

“司徒博士的热诚，我们感激而且佩服。不过，以蒋先生目前的处境，已无法与日本交涉和平；目前进行组织‘政府’，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立场，以便利进行交涉。如果我们的‘政府’在组成以前，重庆跟东京的和谈，已经在进行；那么成立新‘政府’这一层，自可从缓。倘如重庆与东京能够达成停战的协定，则新‘政府’虽已成立，亦可随时取消。”

这样彻底的表示，司徒雷登为之动容；便进一步问道：“照周先生的说法，不知道汪先生是不是同意？”

“我们可以完全代表汪先生，保证履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，请司徒博士代为向蒋先生表明：我们所做的事，纯在求取全面和平，决不会成为重庆与东京和谈的障碍。”

岑德广所提出的，如果和谈实现，希望美国居间保证。周佛海不赞成他的这种主张，因为不论如何，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事，邀请另一国居间保证，无异自请他国来干预内政；不过司徒雷登已经很爽快地作了承诺，也就不必再提任何异议了。

“周先生，”司徒雷登又说：“我大概在月底才会从上海动身；如果汪先生还有什么意见要我带到重庆，我是乐于效劳的。”

周佛海知道他的言外之意，对于他刚才所说的，可以代表汪精卫保证“新政府”将不会成为和谈障碍的声明，希望进一步获得本人的确认；因而毫不迟疑地答说：“在司徒博士启程以前，不妨再叙一叙；我可以把汪先生在这方面的意见，详细奉告。”

## 2 悔不当初

### 陈公博、周佛海悔杀当年 参加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。

谈话到此，可说是到了圆满结束的时候；但司徒雷登兴犹未尽，而傅泾波却又提出一个深具意义，也令人深感兴趣的问题。

“我们研究过汪先生和周先生倡导和平的动机之一，是为了反共；华北日军司令多田骏曾经表示，希望蒋委员长改变容共抗日的政策；而据说‘新政府’使用的青天白日旗上面，有‘和平、反共、建国’的字样，说明了中日和平与反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但是，大家都知道，周先生与陈公博先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催生者；由发起共产党到坚决反对共产党，是什么力量来推动了这个 180 度的转变？”

“理论！”周佛海平静而简洁地答了这两个字；“不过公博是就经济方面看透了马克思主义根本不通；我是从鹿儿岛七

高毕业以后，升学京都帝大，听了河上肇博士的课，又彻底研究了著作，从政治方面看透了马克思主义在当前的中国，根本不能实行。”

“周先生参加共产党，是在七高时代？”

“是的。那是在 1921 年夏天；在上海举行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’。出席代表 13 人；代表上海、北平、长沙、广州、武昌、济南这 6 个地区的 57 名党员。”

“只有 57 个人？”

“是的。像广州，公博跟谭平山叔侄一共 3 个人，就成立了广州共产党。那次广州的代表就是公博；我跟毛泽东是长沙的代表。但是所谓‘南陈北李’都没有参加：因为——。”

因为“北李”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。暑假正是整顿内部的时候，他身为馆长，不容他请假南下；“南陈”陈独秀则方为陈炯明聘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，亦以同样的理由，无法分身。因此，这一次“大会”的主席，就由曾经去过俄国的张国涛担任。

“据公博后来告诉我，他之脱离共产党，就起意于对张国涛的不满；公博一向喜欢观人于微，当时张国涛的处置，我倒并不以为不当，而公博看出来，事情是这样：最初决定，开会为了安全问题，应该逐日更换地点，但一连 4 天，都在法租界贝勒路，上海代表李汉俊家开会。公博便问张国涛何以与原议不符？你们知道张国涛怎么说？”

张国涛说：李汉俊是有问题的，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的理论，而是克伦斯基的理论；他是黄色的，不是赤色的。原来俄国 1917 年发生的“二月革命”，是军队不奉政府弹压罢工

工人的命令；国会亦起而反对政府；俄皇下令解散国会，而国会置之不理，成立了临时政府，由克伦斯基担任主席。不过，临时政府虽由专制改为共和，但实权操在资产阶级手中，所以当时认为“二月革命”乃是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”；以后在作为俄共党史的“简明教程”中，更一再强调，临时政府是“资产阶级专政”；这与列宁的“无产阶级专政”的理论，自然水火不容。

然则这一连4天在李汉俊家开会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张国涛说，因为李汉俊的立场有问题，所以在他家开“大会”似乎已引起他的恐慌；“他越是恐慌，我们越要在他家开会！”张国涛这样很得意地对陈公博说；脸上的神色，仿佛是虐待狂者获得满足时的反应。

陈公博却大起反感，认为既属“同志”，应该相见以诚，相待以义；张国涛这样做，不仅故意与李汉俊为难，甚至连“同志”的安全都不顾，共产党开第一次“代表大会”，便有这种同舟敌国的现象，使得陈公博内心的满腔热情，顿时降到零度。

再有件事，气得陈公博几乎要退席。有一件提案是：禁止共产党员参加政治，连教员都不许当。也许张国涛是希望逼着共产党员去当“无产阶级”的“工农”；以为参加政治就是做官，与组织的要求不符，但何至于连从事教育都不许？岂非荒谬绝伦！

尽管陈公博全力反对，但在张国涛坚持之下，居然照案通过。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再开会时，张国涛自动提出取消前一天的决议；陈公博自然要提出质问。张国涛的答复是：俄

国代表的意见。

原来那时“第三国际”有两个代表派在中国，一个叫吴庭斯基，一个叫马林；组织中国共产党，即出于吴庭斯基的策动，在这次“全代会”中，俨然君临的姿态，陈公博本就有些看不惯；现在听张国涛恬不知耻地表明，一两个俄国人竟可推翻“大会”通过的议案，自然气愤难平；疾言厉色地说：“这样子不必开什么会，只由俄国人发命令算了！”当场冲突，不欢而散。

到得最后一天，终于出麻烦了。他们开会总是在晚上，这天人还没有到齐，正在闲谈时，李家的仆人上楼报告，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在问他：你们经理在家不在家？一听这话，深具秘密工作经验的吴庭斯基和马林，立刻主张解散。于是张国涛领头，纷纷下楼，开了前门逃散；上海的“弄堂房子”习惯由后门出入，所以前门反变成比较安全的“太平门”了。

陈公博本来心恶张国涛不顾“同志”危险，专跟李汉俊为难；及至急难来时，先就逃得快，那就不但心恶，而且心鄙了。此时他一方面觉得有跟李汉俊共患难的必要；一方面也想了解张国涛何以对李汉俊的恶感如此之深，所以留下来不走，跟李汉俊谈谈。

李汉俊开了一听长城牌香烟，一人抽了一支，谈不到三五句话，3个法国“三道头”带着4个“包打听”上楼来了。

“不准动！”有个包打听大喝一声。

李汉俊想尽主人之礼，坐在那里探手去取烟罐，准备敬客，那知手刚一伸，又吓一大跳！

“叫你不准动，就不准动！”声音愈来愈粗暴了。不许动，不许说话，甚至不许喝茶——怕茶中预置了毒药；不过烟罐就在陈公博面前，他取烟抽，却未被禁；一支接一支，等搜索了一个多钟头，又问了李汉俊许多时候的话，恰好 48 支烟抽完，就轮到陈公博受讯了。

陈公博不懂法语，“包打听”翻译着说：“总办大人问你是不是日本人？”

陈公博大为诧异，便用英语问“总办”：“你能不能说英语？”

“行！”总办用英语问：“你是不是日本人？”

“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，我不懂你为什么怀疑我是日本人？”

“现在我更加怀疑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似乎不懂他说的中国话。”

“哪有这回事？”陈公博转脸用广东味道的“京腔”向包打听说：“他说我不懂你的话；请你告诉他，我懂不懂。”

等包打听为他证明以后，总办问道：“你这次由什么地方来？”

“我是由广东来的。”

“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，暑假到上海来看朋友。”

“看哪些朋友？”

这一问太容易回答了，陈公博手一指说：“喏，这位李先生就是。”